

第二册

吴越春秋 汉书 后汉书 魏志 蜀志

团结出版社

群書治要

(唐) 魏 征 虞世南 褚遂良 等撰 吕效祖 赵保玉 张耀武 主编

考譯

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

第二冊

吳越春秋 漢書 后漢書 魏志 蜀志

群書治要

(唐) 魏 征 虞世南 褚遂良 等撰 呂效祖 趙保玉 張耀武 主編

考譯

目 录

- 卷十 二 吴越春秋治要 /1
卷十 三 汉书治要（一） /5
卷十 四 汉书治要（二） /7
卷十 五 汉书治要（三） /43
卷十 六 汉书治要（四） /79
卷十 七 汉书治要（五） /117
卷十 八 汉书治要（六） /157
卷十 九 汉书治要（七） /189
卷二 十 汉书治要（八）（缺）
卷二十一 后汉书治要（一） /225
卷二十二 后汉书治要（二） /265
卷二十三 后汉书治要（三） /307
卷二十四 后汉书治要（四） /345
卷二十五 魏志治要（上） /383

卷二十六 魏志治要（下） /433

卷二十七 蜀志治要 /481

吴越春秋治要

【考评】

《吴越春秋》，东汉赵晔著。原书十二卷，今存十卷。书中叙述吴自太伯至夫差、越自无馀至勾践的史事。于旧史所记外，增入不少民间传说，颇富文学趣味，有补充正史缺漏的史料价值。案：此十卷本，源出宋前，系经晋杨方削繁六卷本、皇甫遵合二书考定而注的本子。元大德十年，徐天祐的十卷，乃因袭皇甫十卷本翻刻宋本流传至今的通行本。事实上，这十卷本显系一部卷帙缺佚两卷的残籍。如《文选注》、《吴地注》、《水经注》等所引吴越春秋事，皆不见于今十卷本，疑当在所佚的两卷内。何况，除了赵晔著《吴越春秋》外，还有后汉张翊的《吴越春秋外记》等，是否与今十卷本有关，已无法详悉。

魏征所摘引的两则，从其内容看，属于正谏类。其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大体与今通行本一致，但行文略有出入。另，“白龙鱼服”则不见于通行的十卷本。

吴王夫差闻孔子与子贡游于吴，出求观其形，变服而行，为或人所戏而伤其指。夫差还，发兵索于国中，欲诛或人。子胥谏曰：“臣闻昔上帝之少子，下游青冷之渊，化为鲤鱼，随流而戏，渔者豫沮射而中之。上诉天帝。天帝曰：‘汝方游之时，何衣而行？’少子曰：‘我为鲤鱼。’上帝曰：‘汝乃白龙也，而变为鱼，渔者射汝，是其宜也，又何怨焉！’今夫大王弃万乘之服，而从匹夫之礼，而为或人所刑，亦其宜也。”于是，吴王默然不言。

【译文】

吴王夫差听说孔子和子贡来吴国游览，想看看他俩的模样，就穿着便服出宫，却被街市上一个人戏弄，而且伤了手指。夫差回宫后，发动兵士，在都城搜查，要杀掉这个人。伍子胥劝他说：“我听说昔日天帝的小儿子下界，变成一条鲤鱼，在一个清冷的深泉中游玩，被一个叫豫沮的打鱼人射中。他回到天宫，告诉天帝。天帝说：‘你去游览之时穿什么衣服？’少子说：‘我变作鲤鱼。’天帝说：‘你本来是条白龙，却变成鲤鱼，打鱼人射你是符合情理的，又有什么埋怨的呢？’现在大王不穿帝王的服装，却按照百姓的规矩行事，从而被人所伤，这也是符合情理的。”于是吴王沉默无言。

吴王夫差兴兵伐齐，掘为渔沟，通于商、鲁之间，北属之沂，西属之济，欲以会晋。恐群臣之谏也，乃令于邦中曰：“寡人伐齐，敢有谏者死。”太子友乃风谏，以发激吴王之心。以清朝时，怀丸挟弹，从后园而来，衣浣履濡。吴王怪而问之曰：“何为如此也？”友曰：“游于后园，闻秋蝉之鸣，往而观之。夫秋蝉，登高树，饮清露，其鸣悲吟，自以为安，不知螳螂超枝缘条，申要举刃，搏（搏原作縊）其形也。夫螳螂，愈心而进（愈心而进原作愈心财进），志在利蝉，不知黄雀徘徊枝叶，欲啄之也。夫黄雀但知伺螳螂，不知臣飞丸之集其背也。但臣知虚心，念在黄雀，不知阱堦在于前，掩忽陷坠于深井也。”王曰：“天下之愚莫过于斯。知

贪前之利，不睹其后之患也。”对曰：“天下之愚非但直于是也，复有甚者。”王曰：“岂复有甚于是者乎？”友曰：“夫鲁守文抱德，无欲于邻国，而齐伐之。齐徒知举兵伐鲁，不知吴悉境内之士、尽府库之财，暴师千里而攻之也。吴徒知逾境贪敌往伐齐，不知越王将选其死士，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灭吴国（旧无吴国之吴字，补之，下吴国同）也。臣窃观祸之端，天下之危，莫过于斯也。”王喟然而叹，默无所言，遂往伐齐，不用太子之谏。越王勾践闻吴王北伐，乃帅军溯江以袭吴，遂入吴国，焚其姑苏之台。

【译文】

吴王夫差兴兵伐齐，在宋、鲁两国之间暗暗地挖掘壕沟，北接沂水，西接济水，欲同晋国在黄池附近会合。他怕大臣们来劝阻，就命令国内说：“我要攻打齐国，谁若敢来劝阻，就处死。”太子友于是采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去劝谏，以求打动吴王之心。清晨，他带上弹丸，手握弹弓从后花园来到宫中，衣服鞋子都湿了。吴王觉得奇怪，问他说：“你干什么了，把衣服鞋子搞得湿淋淋的？”太子友说：“刚才在后花园游玩，听见秋蝉的鸣叫声，就去观看。那秋蝉登上高高的树梢，喝着清澈的露水，其鸣叫的声音凄切如吟，自以为很安全，却不知螳螂越过树枝，沿着枝条，伸直细腰，高举前爪，形成捕捉秋蝉的态势。螳螂小心翼翼地向前爬，一心只在顺利地捕蝉，却不知道黄雀徘徊于枝叶之中，欲啄螳螂。那黄雀只知道伺机捕啄螳螂，不知道我将要射出的弹丸正瞄准其背脊。而我，只是一门心思都放在黄雀身上，却不知道坑穴就在身旁，稍不留神，忽然掉进深坑。”吴王说：“天下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，只贪图眼前的利益，看不到身后的祸患。”太子友说：“天下愚蠢之事不是只有这些，还有比这更甚的。”吴王说：“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？”太子友说：“鲁国遵守先王法度，持守德行，对邻国没有什么邪念，但齐国却起兵攻打它。齐国只顾起兵攻打鲁国，不知道吴国尽数动用国内之兵，竭尽府库中的资财，军队不顾风吹日晒，奔行千里去攻打它。吴国只知道越过国境去攻打不属于自己的国土，不知道越国即将挑选敢死的勇士从三江口出发，进入太湖及附近四湖，来屠杀吴国民众，进而想灭掉吴国。我

自己认为祸乱的开端、天下的危机，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了。”吴王长叹一声，沉默无语，但还是北上伐齐，不接受太子友的劝告。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北伐齐国，就率领军队，沿江而上，袭击吴国，并进入吴国境内，烧掉吴国的姑苏台。

(吕效祖 张爱玲译)

汉书治要（一）

【考评】

《汉书》为东汉班固著，一百篇，分一百二十卷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创始于班彪断《史记》而作的《后传》。彪死，子固整理补充，撰成本书。其中八表和《天文志》未成稿，由班固妹班昭和马续续成。班固自叙编《汉书》的目的是：“固以为唐、虞、三代，《诗》《书》所及，世有典籍，故虽尧舜之盛，必有典谟之篇，然后扬名于后世，冠德于百王，故曰‘巍巍乎其有成功，焕焕乎其有文章也’。汉绍尧运，以建帝业，至于六世，史臣乃追述功德，私作本纪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。太初以后，阙而不录，故探撰前记，缀辑所闻，以述《汉书》，起元高祖，终于孝平、王莽之诛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，综其行事。旁贯五经，上下洽通，为《春秋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，凡百篇。”《汉书·叙传》所述篇目是：帝纪有《高祖纪》《惠帝纪》《高后纪》《文帝纪》《成帝纪》《景帝纪》《武帝纪》《昭帝纪》《宣帝纪》《元帝纪》《成帝纪》《哀帝纪》《平帝纪》等十二篇，表有《异姓诸侯王表》《诸侯王表》《王子侯表》《高、惠、高后、文功臣表》《景、武、昭、宣、元、成功臣表》《外戚恩泽侯表》《百官公卿表》《古今人表》等八篇，志有《律历志》《礼乐志》《刑法志》《食货志》《郊祀志》《天文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地理志》《沟恤志》《艺文志》等十篇，列传有陈胜至吴芮等列传四篇、荆王至中山孝王等列传八篇、季布至扬雄等列传四十五篇、《儒

林列传》一篇、《循吏列传》一篇、《酷吏列传》一篇、《货殖列传》一篇、《游侠列传》一篇、《佞幸列传》一篇、《外戚列传》一篇、《元后列传》一篇、《匈奴》《西域》等列传三篇、《王莽列传》一篇、《叙传》一篇等，共七十篇。本书体例大体与《史记》相同，唯改书为志，废世家入列传，并创《食货》《刑法》《五行》《地理》《艺文》五志，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。自《食货志》创立，到《清史稿》为止，历代史家一直沿用，成为研究历代经济发展和封建剥削的珍贵史料。《艺文志》的创立对指导人们怎样分门类地翻阅古书、对于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帮助。《百官公卿表》叙述秦汉官制沿革，并排比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，简明扼要。

魏征编撰《群书治要》收录《汉书》最多，从本纪、志到列传共八卷，可惜《群书治要》流传日本后一千余年，《汉书》已佚其首尾两卷，首卷估计是《本纪》，末卷估计仍为《列传》，均不知所录为谁。十志中魏征仅录《礼乐》《刑法》《食货》《艺文》四志的精华。七十篇传中，末卷不知所录外，有韩信、黥布、楚元王交、季布、萧何、曹参、张良、周勃、樊哙、酈食其、陆贾、娄敬、叔孙通、蒯通、贾谊、爰盎、晁错、张敖子、冯唐、汲黯、贾山、邹阳、枚乘、路温舒、苏建、韩安国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公孙弘、卜式、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、贾捐之、东方朔、朱云、隽不疑、疏广、于定国、薛广德、王吉、贡禹、魏相、丙吉、京房、盖宽饶、诸葛丰、刘辅、郑崇、萧望之等五十人。魏征辑录《汉书》时，在夹注中多次引用东汉末史学家荀悦所著《汉纪》的史料，来作为班固《汉书》的注脚。范晔在《后汉书》评论荀悦《汉纪》时说：“辞约事详，论辩多美。”

汉书治要（二）

志

六经之道同归，而礼乐之用为急。治身者斯须忘礼，则暴慢人之矣；为国者一朝失礼，则荒乱及之矣。人函天地阴阳之气，有喜怒哀乐之情。天稟其性，而不能节也。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。故象天地而制礼乐，所以通神明、立人伦、正情性、节万事者也。哀有哭踊之节，乐有歌舞之容，正人足以副其诚，邪人足以防其失。故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乖，而淫僻之罪多；乡饮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乱，而争斗之狱繁；丧祭（丧祭原作祭祀）之礼废，则骨肉之恩薄，而背死忘先者众；朝聘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而侵陵之渐起。故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（行原作刑）之，刑以防之。礼乐政刑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
【译文】

六经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《礼》《乐》的宗旨是相同的，而其中《礼》《乐》的功用最为紧要。修养身心如果片刻遗忘礼义，则暴躁、

倨傲情绪就会乘虚而入；治理国家的人一旦失掉礼制，则迷惑混乱之事就会发生。人包含天地阴阳之气，有喜怒哀乐之情。上天赋予人本性而人却不能节制，圣人可以做到节制但也不能断绝，所以就按天地的形象而制礼作乐，这都是为了通达神明、建立人伦、端正性情、节制万事万物的。哀伤时有痛哭跳跃的礼节，快乐时有歌唱舞蹈的仪容，这对行为端正之人足以助益其诚心，对行为不正之人足以防范其失礼。所以婚姻的礼节废弃，那么夫妇之道就会不协调，淫乱邪僻的过错就会增多；乡饮的礼仪废弃，那么长幼的次序就要混乱，争夺打斗的官司就会繁多；丧祭的礼节废弃，那么骨肉亲情就会淡薄，违背死者忘记祖先的人就会众多；朝聘的礼仪废弃，那么君臣的位次就会错失，侵夺欺凌的事也就渐次发生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安稳君上、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制更好的；移风易俗，没有比音乐更好的。”礼能节制民心，乐能调和民声，用行政的办法推行，用刑罚的措施防范。礼乐刑政四种方式互通而不相违背，那么王道就算是完备了。

乐以治内而为同〔同于和乐也〕，礼以修外而为异〔尊卑为异〕。同则和亲，异则畏敬。和亲则无怨，畏敬则不争。揖让而天下治者，礼乐之谓也。王者必因前王之礼，顺时宜，有所损益，即民心稍稍制作，至太平而大备。周监二代，礼文尤具，事为之制，曲为之防，故称礼经三百、威仪三千。于是教化浹洽，民用和睦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，圉圉空虚，四十余年。及其衰也，诸侯逾越法度，恶礼制之害己，去其篇籍。遭秦灭学，遂以乱亡。汉兴，拨乱反正，日不暇给，犹命叔孙通制礼仪，以正君臣之位。高祖悦而叹曰：“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。”遂定仪法，未尽备而通终。至文帝时，贾谊以为：“汉承秦之败俗，弃礼义，捐廉耻，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，期会为故，至于风俗流溢，恬而不怪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纲纪有序，六亲和睦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人之所设，不为不立，不修则坏。”乃草具其仪，天子悦焉。而大

臣绌、灌之属害之，故其议遂寝。至武帝即位，议立明堂，制礼服。会窦太后不悦儒术，其事又废。后董仲舒言：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务德教而省刑罚。今废先王之德教，独用执法之吏治民，而欲德化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是故古之王者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。至周末世，大为无道。秦继其后，又益甚之。今汉继秦之后，虽欲治之，无可奈何。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，如以汤止沸，沸（旧无此沸字，补之）愈甚而无益。譬之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。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以善治，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，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。”是时上方征讨四夷，锐志武功，不暇留意礼文之事。

【译文】

用音乐来调理内心而使情志相同，用礼制来整治外事而使尊卑有别。情志相同就会和谐亲睦，尊卑有别就会敬服恭肃。和谐亲睦就没有怨恨，敬服恭肃就不会争斗。通过互相礼让而使天下太平，这就是礼乐的宗旨。做君王者必定是沿用前代君王的制度礼仪，再顺应时代之所宜而有所增减，顺乎人民的意愿而逐渐制定，直到天下太平而才算完备。周朝借鉴于夏、殷二代，礼制的条文尤其完备，大事上定有制度，小事上也都有防范，故而号称典礼制度三百条、礼仪细节三千款。于是政治教化透彻普遍，人民行事谦和亲睦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起，监狱空虚达四十多年。及至周室衰败后，诸侯超越法度，憎恨礼仪制度妨害自己，丢弃礼制的篇章典籍。后来遭逢秦代毁灭学问（指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），记载礼乐制度的典籍遂因混乱而亡失了。汉朝建立，拨乱反正，尽管事务繁多而且时间急迫，但还是命令孙叔通制定礼仪，来端正君臣的名分。高祖高兴地感叹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了。”遂定礼仪之法度，此事还未完全结束而孙叔通去世。到了文帝时，贾谊认为：“汉朝承续秦代的不良风俗，丢弃礼仪，抛弃廉耻，而大臣只是以文案簿书

报答为事务，以至于对败坏的风气流传、充斥现象，恬然不以为怪。说到移风易俗，让天下人回心而趋向正道，这些事就不是一般官吏所能办到的啊。确定君臣的职责，区分上下的位次，使国家纲纪有序，六亲和睦相处，这不是应由上天做的事，而是由人所设定的。人之所设，不去做就不能建立，不整治就会败坏。”贾谊便草拟了有关法则，皇上很高兴，但是受到大臣绛侯周勃和灌婴等人的妒忌，所以贾谊的主张便因此而中止了。到了武帝即位，商议设立明堂，制定礼服。适逢窦太后不喜欢儒术，这件事又被搁置下来。后来董仲舒陈言说：“君王是顺承上天的意旨而办事的，所以致力于德教而减少刑罚。而今废弃先王的德教，单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人民，却想让道德教化覆盖四海，故而难以成功。所以古时候的君王，没有人不以教化为要事，设立大学在国都施行教化，设立庠序在郡邑普及教化。(道德)教化得以昭明，(良好的)习俗得以形成，天下曾经出现没有一个犯人的监狱。到了周代末年，大行无道之事。秦朝步周末后尘，这种情形更加严重。当今汉朝继秦之后，即使想整治教化，也是无可奈何。法律一出而奸邪顿生，命令一下而欺诈兴起，好像以开水止沸，水沸腾更甚而无济于事；犹如琴和瑟的音调不协调，严重时必须解弦更张，方可以演奏。治理国家政务却贯彻不下去，严重时必须变更改换它，才可以治理。从汉王朝建立以来，常常想以善政治理好国家，然而至今还不能实行仁政，从而使残暴的人化而为善，并废除刑杀，其失误就在应当变化却未能变化啊。”当时，天子正在征讨四夷，专心致志于武功，没有工夫留意礼仪教化之事。

至宣帝时，琅琊王吉为谏大夫，又上疏言：“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未有建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”上不纳其言。至成帝时，刘向说上：“宜兴辟雍，设庠序，陈礼乐，隆雅颂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，未之有也。或曰，不能具礼。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，或至死伤。今之刑，非皋陶之法也，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

削，笔则笔，救时务也。至于礼乐，则曰不敢，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夫教化之比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。且教化所恃以为治，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，非所以致太平也。”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，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。营表未作，遭成帝崩。世祖受命中兴，即位三十年，四夷宾服，政教清明，乃营立明堂、辟雍。明帝即位，躬行其礼，威仪既盛美矣。然德化未流洽者，以其礼乐未具，群下无所诵说，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。

【译文】

到了宣帝时，琅琊郡的王吉做谏议大夫，又上疏说：“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王，并非代代皆有，公卿有幸遇到治世，却没有具备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策略，从而将明主推举到夏商周三代君王那样高度的人。他们所重者只在于公文簿书和断狱听讼这些事务上罢了。这不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根本所在啊。”皇上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到了成帝时，刘向向皇上陈奏：“应该兴办天子直管的大学，设立地方学校，宣扬礼仪音乐，使雅颂之声兴盛，倡导揖让的风气，用来感召教化天下。像这样做天下还不能太平，这种事情还从未有过。有人说，不可能使礼仪完备。礼仪是以培养教育人为根本的，如果有过失差错，其过失差错也是用来培养教育人的。而刑罚若有过失差错，便可能致人死伤。今天的刑罚，不是古代皋陶时的法律，是主管官员请求制定法律，想删除就删除，想记载就记载，为的是补救时务。至于礼乐，却认为不敢修订，这种论调就如同敢于杀人而不敢培养教育人啊。教化和刑法相比，刑罚为轻，这是舍弃重要的而急于从事次要的。况且教化是实现太平的依靠，刑法只是用来辅助治理的，如果废弃所依靠的而仅保存所辅助的，这绝非实现国家太平的办法。”成帝把刘向的意见交付下边公卿来讨论。丞相大司空上奏请设立天子直管的大学，建造大学的图表还未完成，恰逢成帝驾崩。光武帝受命中兴，即位三十年，四夷宾服，政教清明，于是设立了明堂、大学。明帝即位，亲自实行礼教，礼节、仪文都很美善。然而道德教化还未能广泛流传，是因为礼乐还未完备，群臣还无所诵说，并且地

方学校还没有设立起来的缘故啊。

夫人宵天地之貌〔宵，化也，言禀天地气化而生也〕，怀五常之性〔仁义礼智信也〕，聪明精粹〔精，细也；粹，淳也〕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爪牙不足以供嗜欲，趋走不足以避利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役物以为养，任（任原作用）智而不恃力，此所以为贵也。故不仁爱则不能群，不能群则不胜物，不胜物则养不足。群而不足，争心将作，上圣卓然，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，众心悦而从之。从之成群，是为君矣；归而往之，是为王矣。《洪范》曰：“天子作民父母，为天下王。”圣人取类以正名，而谓君为父母。明仁爱德让，王道之本也。爱待敬而不败，德须威而久立，故制礼以崇敬，作刑以明威也。圣人既躬明哲之性，必通天地之心，制礼作教，立法设刑，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，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，因天讨而作五刑。上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凿；薄刑用鞭扑。大者陈诸原野，小者致诸市朝，其所繇来者上矣。自黄帝有涿鹿之战，颡项有共工之陈〔共工主水官，秉政作虐，故颡项伐之也〕。唐虞之际（际原作隆），至治之极，犹流共工，放驩兜，杀三苗，殛鲧，然后天下服。夏有甘扈之誓，殷、周以兵定天下。古人有言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”鞭扑不可弛于家，刑罚不可废于国，征伐不可偃于天下。用之有本末，行之有逆顺耳。

【译文】

人承禀天地之气而化生，包藏“五常”（指仁义礼智信）的本性，聪明灵敏，精细淳美，是所有物类中最具有智慧的群体。人的手脚、牙齿不足以供给自己的嗜欲，奔走的能力不足以躲避祸害，没有羽毛来抵御寒暑，就必须役使其他物类来养活自己，使用智慧而不是依靠体力，这就是人类之所以尊贵的原因。所以，人不讲仁爱就不能聚合，不能聚合就不能战胜其他物类，不能战胜其他物类就不足以养活自己。群聚而

供给不够，争夺的思想必将形成。上古的圣人，卓然首先行施恭敬礼让博爱之恩德，众人便心悦诚服地追随他。追随者成群，他就会成为至尊之人；众人归顺投靠他，他就成为君王了。《洪范》上说：“天子能充当民之父母，方可成为天下之王。”圣人选取可以类比者为之正名，便称君为父母。明白仁、爱、德、让，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。仁爱依靠谦敬才不会衰败，德行须有威严才能长久树立，所以制定礼仪来推崇谦敬，制定刑法来显示威严。圣人已经具有洞察事理的本性，必能通达天地的存心，制定礼仪兴起教化，建立法律设置刑罚，一举一动皆顺民情而效法天地。所以圣人根据上天规定的品秩等级来制定“五礼”，按照上天的惩戒意向而确定“五刑”。最高的刑罚是动用军队来剿灭，其次是使用斧钺来诛杀；中等的刑罚是使用刀锯来断肢，其次是使用钻凿来刻刺面额；最轻的刑罚是用皮鞭来抽打。规模大的陈尸于原野，范围小的示众于街市。这种情况其由来已很久了。即使黄帝，也有涿鹿之战；即使颡顼，也有对共工的讨伐。唐尧虞舜时期，天下治理得最好，犹且流放共工、驱逐灌兜、流放三苗、放逐鲧，然后使天下归服。夏启曾有在甘征伐有扈氏的誓词，殷、周用武力平定天下。古人曾说：“上天生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材，百姓一并使用它们，废弃一样都不行，谁又能丢弃武力呢？”鞭打的责罚不可以在家庭去除，刑罚不可以在国家废弃，征伐不可以在天下停止。只不过使用刑罚有主次本末之别，施行刑罚有顺时背理之分罢了。

孔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文德者，帝王之利器；威武者，文德之辅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，则武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则威之所制者广。三代之盛，至于刑措兵寝者，以其本末有序，帝王之极功也。春秋之时，王道寝坏，礼乐不兴，刑罚不中，陵夷至于战国。韩任申子，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；增加肉刑，大辟有凿颠、抽（抽原作押）胁、镬烹之刑。至于始皇，兼吞战国，遂毁先王之法，灭礼义之官，专任刑罚，躬操文墨，而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圜墙成市，天下愁怨，